

“开放社会之父”——
——波普尔

[英] 布赖恩·马吉 / 著 南砚 / 译



“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

[英]布赖恩·马吉 著

南 砚 译

责任编辑：张 晓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75 插页：2

字数：73000 印数：1—10300

ISBN7—217—00437—3

C·17 定价：1.85元

湘人：88—4

编 者 的 话

当代文化巨擘们的成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面对这些财富，我们是寻找各种理由拒绝呢，还是以客观的态度译介和研讨呢？当代中国大众的回答当然只能是后者。为此，我们向广大读者推出这套《西方著名学人丛书》。

这套丛书是从英国 FONTANA 出版公司的一套很有影响的 FONTANA MODERN MASTERS 丛中精选翻译过来的，所译介的都是十九世纪以来在思想领域中有重大建树的著名人物，这些思想家多数为我国读者和学术界所注目，也有一些对于我国读者来说还比较陌生。丛书介绍了他们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对他们学说的价值、影响及其缺陷作了分析和评价。撰写该丛书的作者都是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因此，整套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翻译出版对于我国学术工作者了解

和评价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体系的对外开放，都有一定的意义。

这套丛书行文流畅，语言通俗，一扫晦涩艰深的学究文风，对这些学人的深奥复杂的学说作了深入浅出的评介，一般读者也能够在这的帮助下获得当代人类文化的丰富知识和新的信息。至于其中某些不尽正确的观点则由各书译者在译序中作了一些说明，也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第二编辑室

译者前言

卡尔·波普尔（1902— ）既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政治哲学家。他的思想涉及许多领域，在思想界甚至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于本书的作者把他的哲学称之为“行动的哲学”。

波普尔自1934年出版第一本哲学著作（《研究的逻辑》）以来一直在思想领域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建立了庞大而又富有真知灼见的哲学体系。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的哲学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英国著名学者，本书作者布赖恩·马吉（Bryan Magee，1930年生，曾著有《新激进主义》、《民主革命》、《现代英国哲学》和《叔本华的哲学》）站在哲学和哲学史的高度，对波普尔的哲学体系（科学哲学、认识论和社会政治哲学）作

了全面论述,区别了波普尔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的不同,高度评价了波普尔哲学的成就,认为波普尔的哲学与传统的科学方法论、认识论决裂了,把科学哲学甚至社会政治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诚然,二十世纪是科学确然性、社会理想消失的时代,人类一切活动似乎丧失了理性的根据。其结果,在哲学上表现为,要么走向宗教(如新托马斯主义),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如存在主义),要么放弃形而上学的确然性而追求经验的确然性(如逻辑实证主义),等等。波普尔认为这一切是由错误的传统科学观念所造成的。波普尔完全否定了传统的科学概念与科学方法观。他认为科学之所以科学不在于它的可证实性,而在于它的可证伪性,科学不是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过程,而是从猜测到反驳的过程。科学虽然不象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可以获得确然的真理,但可以发现错误、修正错误。这样,他破除了旧的确然性观念,以一种新的方式建立了另一种确然性(消错的确然性),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重新找到了根据,这无疑对二十世纪亲身经历着确然性、根据消失却又被传统的确然性观念束缚的人们起了“解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波普尔的哲学在一度遭到冷遇和误解之后,正在获得显

赫的声誉。

波普尔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对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就知名度而言，他足可以和任何一位现代西方哲学家媲美。但是，作为完整的波普尔，知道他的人恐怕并不多。本书译者真诚希望读者能够批判地从《波普尔》中获得完整的波普尔哲学形象，同时也希望读者能够从中分享作者本人对波普尔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英文本是由外籍教师罗吉尔·布兰德肖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再加上时间仓促，译文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7年10月9日

此书尽管篇幅很小，但是由于得到下列同仁对初稿所作的指正，受益非浅：博伊尔勋爵、第雷尔·伯吉斯先生、欧恩斯特·格尔莱教授、欧恩斯特·哥莫布里奇爵士、大卫·末勒先生、约翰·瓦特肯斯教授、伯纳德·威廉斯教授和卡尔·波普尔爵士。

人创造了各种新世界——语言的、
诗歌的、科学的；其中，尤为重要的乃是
道德要求世界：要求平等、自由、扶助
弱者。

——《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

第1卷，第65页

目 录

第 1 章	序言	(1)
第 2 章	科学方法：传统观点和波普 尔的观点	(13)
第 3 章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30)
第 4 章	波普尔的进化论和世界 3 理论	(63)
第 5 章	客观知识	(75)
第 6 章	开放社会	(87)
第 7 章	开放社会的敌人	(104)
	书目提要	(133)
	后记	(136)

第1章

序 言

勿容置疑,迄今为止卡尔·波普尔的名字尚未在知识界家喻户晓。这一事实有必要加以解释。根据艾赛亚·贝尔林 (Isaiah Berlin) 在其卡尔·马克思传记 (1963年第三版) 中所说,“在在世的作者中”,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包含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学说的最谨慎、然而最慑人的批判”; 如果这个评价多少接近事实,那么波普尔就是——在三分之一的居民生活于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府中的世界中——世界性的重要人物。然而撇开这种事实,许多人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在世科学哲学家——的确,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彼得·梅达华 (Peter Medawar) 爵士1972年7月28日在英国 BBC 广播电台第三台中说道:“波普尔是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最伟

大的科学哲学家。”另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公开承认波普尔对他们的工作的影响。其中包括雅克·莫诺德 (Jacques Monod) 和约翰·埃克里斯 (John Eccles) 爵士。埃克里斯在其《面对现实》一书中写道：“……我的科学生活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一九四五年的转变，可以这么说，要归功于波普尔关于科学研究方式的学说……在阐述和研究神经生物学的过程中，我一直遵循着波普尔的学说。”埃克里斯对其他科学家的劝告是，“阅读和思考波普尔关于科学哲学的著述，并且把它们作为科学生活的活动基础接受过来。”不仅仅实验科学家持这种观点。杰出的数学家和理论天文学家赫尔曼·邦笛 (Hermann Bondi) 爵士言简意赅地说：“科学最重要的莫过于它的方法，而方法最重要的莫过于波普尔所述说的。”波普尔的思想影响范围很大——这是在世的说英语的哲学家无可匹敌的——从政府成员到艺术史家都受其影响。欧恩斯特·哥莫布里奇爵士在《艺术与幻想》(肯尼思·克拉克把它描绘为“我所读过的关于艺术批评的最杰出的著作之一。”) 一书的序论中写道：“如果读者感觉到此书洋溢着波普尔的影响，我会由此而感到骄傲。”英国两大政党主张进步的内阁大臣，如安东尼·克罗斯兰德 (Anthony Gosland) 和爱德华·博伊尔 (Edward Boyle) 关于

政治活动的见解一直受到波普尔的影响。

这些例子直接说明了波普尔著作特殊应用范围外的一些重要方面。它们表明——与许多同时代哲学学说不一样——波普尔的学说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们具有显著的实践作用。它改变了他们从事自己工作的方式，因而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简言之，它是一种行动的哲学。而且，它对那些在各自的领域中成就显赫的人们也具有这样的影响。这样，人们很难说波普尔被忽视了。这就越发加强了对这一事实的惊讶：他的知名度并不高——许多小思想家享有比他更大的名声。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机缘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对他学说的无意歪曲所造成的，部分也由于他的方法方面的原因，他的方法容易被那些没有研究它的人所曲解。

卡尔·波普尔1902年出生于维也纳。青少年时代他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一个热情的社会民主党人。除了科学和哲学之外，他不仅在阿德烈的领导下与一些孩子参与了左翼政治活动以及社会工作，而且还参加了硕恩伯格（Schoenberg）创办的私人音乐协会。对他来说，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这是最令人激动的青春时代和场所。学生日子过去之后，他当上了中学教师，教数学和物理，并以此维持生计，但是

他的主要兴趣还是社会工作、左翼政治、音乐——当然还有哲学，在此他发现自己与当时在那个地方流行的时髦哲学存有分歧（从那以后他一直具有这种倾向）。此时此地，对于他的同辈人来说，这种时髦哲学便是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小组成员之一奥托·劳拉士（Otto Neurath）曾给他起了一个“官方反对派”的绰号。这使得他的处境多少有些不妙。他发现，要使自己的早期著作以原样出版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第一本书至今尚未出版^①；他出版的第一本见解新颖的著作《研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1934年秋出版，注明的日期是1935年）是一个粗暴的削略本，它只有原稿的一半，它包含了后来用以反驳逻辑实证主义、并得到公认的论据的主要内容。

在三十年代维也纳政治局势的暴力行为表象背后，左派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日趋消失。后来，在《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第二卷，164—165页）一书中，波普尔把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概述如下：“既然革命必将到来，法西斯主义只能是导致其产生的手段；由于革命显然早已成熟，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俄国已经发生了这种革命，尽管它

^① 参考本书第136页。——译注

的经济条件落后。惟有民主制造的虚幻希望正在妨碍发达国家的革命。因此，法西斯对民主的破坏只能最终消除工人对民主方法的幻想，推动革命。基于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激进派认为这一看法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历史作用’。实际上，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垂死挣扎。因此，共产主义者在法西斯主义者攫取政权之时没有进行斗争（人们没有期待社会民主党人起来斗争）。因为共产主义者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熟，虽然法西斯主义的闹剧必然会日益猖獗，但是它最多只能维持几个月，因此，共产主义者没有必要采取行动。法西斯主义对政权的篡夺从未遇到‘共产主义威胁’。共产主义者未伤其皮毛。”

在此段文字背后的历史现实之中，存在着关于政治策略和道德观的唇枪舌剑式的讨论。波普尔卷入了这些讨论。这些讨论成了他后来大部分政治著述的基础。他以令人沮丧的精确性预言到，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伴随而来的是一场欧洲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的祖国将会站在非正义一边；因而他决定在事变之前离开那里。

（这个决定挽救了他的生命，因为尽管他在童年时代是新教教徒而且双亲受过洗礼，希特勒还是会把他划为犹太人。）1937年至1945年，他

在新西兰大学教授哲学。在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为了研究希腊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他自学了希腊语。在这一时期的中期阶段他用英语写出了《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正如艾赛亚·贝尔林在前面引述过的材料中所说，这是“一部具有罕见的创造性和力量的著作。”波普尔把这本书看作是他的战争著作。最后决定写这本书是在他得知希特勒侵略奥地利的消息的那一天。很久以来他害怕得到这一消息。这一情况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1943年此书完成之际尚未明朗化这一事实加强了他捍卫自由、抨击极权主义的热情。此外，此书还试图对极权主义的发展和要求试图进行解释。此书在1945年以两卷本形式出版，它为波普尔在英语国家中赢得了真正的声望。

1946年他来到了英国，此后他一直住在这里。到达英国之后，他发现在哲学方面盛行的正统观念——如果说有的话——是他在战前维也纳已经超越过的逻辑实证主义。这种哲学是通过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年出版）输入英国的。波普尔自己的《研究的逻辑》仍然没有翻译过来，实际上人们还不知道它；的确，即使它为少数人所熟悉，它的内容也通常被歪曲了。本书英文版直至1959年秋季才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题出版，此时距它的初版已有四分之一世纪。

这个版本包括一个特殊的序言，波普尔在这个序言中划清了自己与（到现在的）最新的、时髦的语言哲学之间的界线。但是语言哲学的主要刊物《心灵》对这本书作了歪曲性的评论，并且对波普尔的序言一字不提。中年时期波普尔本人在英国正象青年时代在奥地利一样，处境不佳。然而长期以来，他一直进行着单枪匹马的、国际性的反驳，这种反驳的不断扩展使他在英国得到了社会的承认（1965年被授与爵士称号）。但是，无论牛津还是剑桥都没赐与他教授职位。然而，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度过二十三年大学生涯，并在那里成为了逻辑学和科学方法教授。

在那些岁月里，他出了另外两本书，这两本都是论文集，大部分都已发表过。《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在1957年问世之际，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写道：“这可能是本年度出版的、唯一的超世纪的书。”（此书的一系列论文曾被《心灵》拒绝发表）它可以被看作《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的姊妹篇。同样，《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63年出版）可以被看作《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姊妹篇。1969年退休之后，他出版了另一本书，也是一部论文集，叫做《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观点》（1972年问世）。也许还有若干本书将会问世，